

观/念/更/新/与/政/策/调/整

正确处理发展经济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合理开发和综合利用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使经济发展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造福于子孙后代。

蔡昉 张车伟 著

战略

发展

持续

可



可持续发展战略

——观念更新与政策调整

蔡昉 张军伟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可持续发展战略：观念更新与政策调整/蔡昉，张车伟著。—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7

ISBN 7-5035-1813-8

I. 可… II. ①蔡… ②张… III. 发展战略，可持续性研究-中国 IV. D6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4712 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北京振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7.375

字数：192 千字 印数：1—4000 册

定价：11.00 元

前　　言

近年来，无论在我国还是在国外，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学术界和决策部门的热门话题。对于这门新兴的学科，本书的作者，作为关心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前途的研究者，也尽力学习和探索个中学问。在阅读国内外文献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领域，在学者们和活动家们之间，居然有着如此多的不一致。

人们注意到，有相当一部分倡导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人物，仅仅把这个问题的提出当作自己的任务。在他们的身上，笼罩着一层悲观主义者的云团。人们很容易把他们看作是马尔萨斯学说的信徒。可持续发展或者更具体地说资源问题、环境问题，对于这些人来说，更多地是一种思潮，是一种信仰，或者干脆就是目的本身。难怪，那些坚信人类社会的进步必将解决所有今天看来大伤脑筋的难题的人（通常是一些比较主流的经济学家），自然而然地以乐观主义者的姿态，站到了他们的对立面。

此外，一部分把可持续发展问题或资源、环境问题当作学问来做的学者，通常是自然科学家或生态经济学家和资源经济学家。尽管他们做了大量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工作，其成果也可谓汗牛充栋，但这些工作似乎仍然处在学问的边缘上面。以生态经济学家和资源经济学家为例，他们的工作常常被主流经济学所忽视，就像伊壁鸠鲁的神一样，只存在于经济学世界的缝隙里。

而那些位居各个学科主流地位的学者们，常常并不把可持续发展问题当作自己的当然关注点。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在经济学界

发生的。当意大利著名作家和活动家拉瓦奥莉发现，经济学家们，特别是那些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对环境问题缺乏足够的热心时，决定采访这些大家。她打电话预约诺贝尔奖获得者弗里德曼教授时，教授的秘书惊讶地说：“环境问题？可是弗里德曼教授是经济学家呀！”

尽管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莫迪格里安尼的说法颇有道理：“有许多问题我从未关注过，环境问题只是其中一个”。但环境、资源问题为当代许多主流经济学家所忽略，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实际上，许多经济学家在这个问题上持有不同的看法。经济学家看重的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人力资本的提高、经济激励和价格机制。

事实上，如果不能把经济学家脑子里面所关心的东西，与生态学家、环境保护主义者的目标相协调起来，可持续发展问题本身就会始终处于思潮之争，难以成为更优先的科学领域和更具体的行动准则。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涉及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文献，总是喋喋不休地讨论定义，或者不厌其烦地描述生态环境恶化的危险性（遗憾的是，本书也未能脱俗），原因就在于难以取得一致的认同。

出于对这种现象的观察，我们没有把本书的目标定在全面阐述可持续发展战略原理和技术细节，而是试图把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与我们已知的经济发展理论，以及我国经济发展现实相结合。这里所谓的“结合”，首先并不意味着我们有能力做到把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与经济理论达到某种程度的融合。我们发现，那事实上是做不到的。我们希望对读者有所帮助的是，一方面利用经济学的一些方法来理解可持续发展问题，以使后者有一种经济学的基础，另一方面用可持续发展观来检验已有的经济发展理论，帮助包括作者自己在内的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更新观念。其次，我们也未敢提出用可持续发展观全面检验经济现实的庞大目标，而是仅就我们从事经济社会问题研究所遇到的现象，拿到可持续发

展战略的新思维框架中来重新认识。与其说我们试图告诉读者什么结果，不如说更希望读者自己同我们一道来做这项工作。

西方的一位学者指出，从可持续性的角度出发，世界人口可以被分为三类：20%的“过度消费者”过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奢侈生活；20%的贫困人口出于生存的本能，正在使他们所依赖为生的资源遭到破坏并趋于耗竭；只有60%的人口采取着一种最接近于可持续的生活方式。^①且不管这60%人口的生活方式是否真正是可持续的，我们看到富人和穷人所造成的不可持续问题，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

因此，任何一个社会要想取得可持续发展，仅仅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或者仅仅倡导可持续发展的价值都是不够的，而更为重要的是关注该社会所处的特殊状态，即它所树立的目标，所面对的现实，可能的机会和存在的制约。为了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必须从多重因素上来理解这种特殊的状态，进而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适当地修正其发展目标，改变存在的现实，把握机会，突破制约。

本书作者长期的研究经历在于经济问题和人口问题，对于可持续发展问题来说，我们仍然处于学习的过程，所以我们未敢提出过大的目标。只是希望能通过本书，促使读者更多地关心可持续发展问题。但是，我们认识到，可持续发展问题应该成为一切经济社会问题研究的一个中心点。因此，这本书的所有章节也都试图帮助读者确立这样的认识。特别是对于那些在经济建设第一线的党政官员和科技工作者，如果在阅读之后，能够把可持续发展观贯彻到工作中去，就是本书最大的成功。由于这本书与其说

^① Durning, A., Asking How Much is Enough, in Brown, L. R. et al., State of the World 1991, Earthscan, 1991.

是讲述原理，不如说是探讨问题，而且限于作者的知识水平，错误在所难免。一方面作者将对任何不妥当之处负全部责任，另一方面也诚挚地欢迎读者提出批评。

作 者

目 录

前言	(1)
绪论 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	(1)
0 · 1 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展望	(1)
0 · 2 中国奇迹会持续吗?	(4)
0 · 3 《21世纪议程》与新发展战略	(8)
第一章 经济发展观的演变	(11)
1 · 1 从马尔萨斯到罗马俱乐部	(11)
1 · 2 有没有增长的极限?	(16)
1 · 3 生态学天地与经济学世界	(21)
1 · 4 可持续性:发展观革命	(29)
第二章 可持续发展的人文含义	(33)
2 · 1 人口增长类型的变化	(33)
2 · 2 增长与发展:目的之辩	(40)
2 · 3 贫困的本质	(47)
2 · 4 面向脆弱的群体	(51)
第三章 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学含义	(55)
3 · 1 生命支持系统的生态学	(55)

3·2 生命的天平:承载力	(62)
3·3 生态学意义上的可持续性	(69)
3·4 人口增长与生态效率	(75)
第四章 重新审视发展过程	(83)
4·1 资源收益和环境代价	(83)
4·2 开发与保护:孰先孰后?	(91)
4·3 公平原则与代际补偿	(97)
4·4 可持续性的经济观	(103)
第五章 可持续发展的激励机制	(109)
5·1 个人决策与公共选择	(109)
5·2 环境外部性与政府定位	(114)
5·3 国际博弈:谁付代价?	(122)
5·4 成本与收益的衡量难题	(127)
第六章 人口大国的抉择	(131)
6·1 历史的重负	(131)
6·2 “地大物博”的神话	(137)
6·3 环境:不是奢侈品	(144)
6·4 人口过渡阶段的挑战	(149)
第七章 谁来养活中国?	(156)
7·1 人口——土地压力陷阱	(156)
7·2 资源约束悖论	(161)
7·3 跨越国界的可持续农业	(167)

第八章 可持续的区域发展	(173)
8·1 区域发展的累积效应	(173)
8·2 贫困——环境恶性循环	(179)
8·3 超越的环境代价	(186)
8·4 消除贫困的多重维度	(193)
第九章 可持续发展战略管理	(198)
9·1 发展阶段与可持续性提高	(198)
9·2 消费模式转变	(204)
9·3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209)
9·4 可持续发展的决策过程	(215)
参考文献	(222)

绪论 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

0·1 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展望

在即将进入 21 世纪之际，江泽民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在十五大报告中描画了下个世纪的宏伟目标：“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 2000 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富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 100 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 100 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个宏伟目标，既是鼓舞人心的，又是有科学保障的。改革以来的近 20 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前所未有的，也是世界罕见的。与改革之初的 1978 年相比，国内生产总值在 1996 年增长了近 4.5 倍，年平均增长 9.9%，同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 3.3 倍，年平均增长 8.4%。

这种增长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数字，而是实实在在的人均收入的提高和生活水平的改善。1978—1996 年期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提高了 4.6 倍，年平均增长率超过 10%；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提高了近 2 倍，年平均增长率 6.2%。如果从人均消费水平来看，同一时期农民和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分别提高了 2.5 和 2.1 倍左右。1978 年我国大约有 2.5 亿农村人口生活在不足温饱的状况中，到 1996 年，这种绝对贫困人口已经下降为 5000 余万。

尽管我国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存在着地区间差异，沿海地区

的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增长，明显超前于中西部地区。但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绩效不仅发生在沿海地区，其他地区的发展也同样是引人注目的。世界银行有一个比喻：如果把中国 30 个省份都拿到世界经济增长中来排序的话，则在 1978—1995 年期间，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前 20 名都名属中国。

按照这种趋势，江泽民总书记描画的下个世纪宏伟目标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预见的：“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那么，到本世纪末以及下个世纪，当我们实现这些发展目标的时候，中国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以及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会是什么样的呢？

根据世界银行《1997 年世界发展报告》中的统计，1995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总量为 6976.5 亿美元。如果保持 1990—1995 年的增长速度，到 2000 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 12740.4 亿美元。从那时起到 2010 年，即使以较低的年平均速度增长，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也是有把握的，即达到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 25534.4 亿美元。

1995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委托一位经济学家，对世界及各国的经济发展历史统计资料进行估计。一个结果是早在 1820 年的时候，中国创造了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 30%，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到 1950 年，中国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下降到不到 7%。^① 从 50 年代以后，这个份额进一步大幅度下降。直到 1995 年，在中国、美国和日本三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和中，中国的份额只有 5%。按照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并假设美国和日本都保持 1990—1995 年的平均增长速度不变，2000 年中国

^① Maddison, Angus, *Monitoring the World Economy 1820—1992*, Development Centre of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Paris, 1995.

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三个国家总和中的份额提高到 9%，到 2010 年则提高到 14%。

因此可以作出进一步的预测，也就是说让我们来看一看江泽民总书记所提到的建党 100 年和建国 100 年时，中国经济总量会是什么样的。我们假设中国、美国和日本都分别以下个世纪头十年的平均速度增长，2020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在三个国家中的份额提高到 23%，2050 年进一步提高到 68%。到那时，中国从经济总量来说已经超过目前最大的美国和日本，成为下个世纪中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际上，根据我国经济学家的估计，按中国、美国和日本在 1980—1991 年的平均增长率推算，我国大约在 2035 年前后，超过美国和日本，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①

经济总量这种可能的变化，相应地会对我国人民生活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95 年我国人口总量大约为 12 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620 美元，是美国同期水平的 2.3%。根据国内生产总值预测，以及人口可能达到的总规模，我们可以推算出：2000 年我国人口达到 12.9 亿，按 1995 年不变价格计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989 美元，大约是美国 1995 年水平的 3.7%；到 2010 年，当国内生产总值再翻一番时，人口假设为 14.4 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 1777 美元，是美国 1995 年水平的 6.6%。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用各国货币的实际购买力，重新估算了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假如用这种购买力平价法替代汇率折算法，估算出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比官方公布的要高 3 倍还多。即 1995 年我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2920 美元。大约为美国当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 10.8%。

对于这种方法的科学性，国际学术界始终存在着争议。我们

^① 参见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

不妨仅仅就其更直接反映实际消费水平这一特点，暂且借来一用。按照购买力平价法计算，2000 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为 4659 美元，是美国 1995 年水平的 17.3%；2010 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8369 美元，是美国 1995 年水平的 31%。

如果以购买力平价法的预测为依据，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总量超过美国和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经济的时间将会大大提前，即大约 2015 年前后就会达到。这与世界银行前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萨莫斯教授的估计是一致的。萨莫斯教授还认为，中国是唯一有潜力超过美国的国家。^①

0·2 中国奇迹会持续吗？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曾经拥有世界上最强盛的经济和最发达的科学技术。然而，当 17 世纪西方世界加快了进步和发展步伐以后，中国却大大落后了。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与其他三个文明古国一道，侧身于发展中国家的行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试图通过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实现对当时西方发达国家的赶超。但是，由于这种发展战略与我国的国情不相适应，从而导致经济体制的一系列扭曲，造成低效率和激励机制不足。再加上过去在很长的时间里，没有把经济建设作为工作重心，使经济增长受到阻碍，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我国经济改革开始以前，不仅未能实现赶超发达国家的目标，反而拉大了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

自从 70 年代末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以来，我国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全面开始，并显示出巨大的效果。只有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国才真正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奇迹。正如前面所作的简

^① 参见胡祖六：《走向富强——国际上怎样估计中国的经济地位》，《经济研究资料》1993 年第 21 期。

单预测所表明的，下个世纪是中国经济赶超世界发达国家的世纪。也可以说，中国与其他三个文明古国一道经历了由盛至衰的过程，而下个世纪的中国，将率先重新走过由衰至盛的道路。

前面提到的那位劳伦斯·萨莫斯教授，对中国经济奇迹给予高度的关注。在一个国际场合，他公开指出：“如果 100 年以后要撰写 20 世纪历史的话，那么，改变当今中国的革命和留有深刻印痕的事件将给世界一个崭新的面貌”^①。

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对于未来经济指标的预测，往往是一种简单的外推，即假设未来事件将以过去的相同轨迹发生。而这种假设通常是相当脆弱的。前面所作的对于下个世纪中国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的描述，还算不上是一种严谨的预测。所以，各种预测可能存在的所有缺陷，在这里同样会遇到。

例如，当我们预期中国经济总量将会超过美国和日本时，首先需要确定的是，中国、美国和日本是否在下个世纪都继续保持过去十年或二十年的平均增长速度。其实，假设美国将会继续以 2.6% 的年平均速度增长，日本继续以 1% 的年平均速度增长，的確是很脆弱的假设。但是，如果我们并不是要预测哪一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也不是要告诉人民届时一定要达到多少多少元的收入水平，而是指出一种趋势，即中国终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人均收入一定会大大高于目前的水平。则我们只需确定两点：第一，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仍然将保持可以与过去相比的高水平；第二，中国经济增长率将继续高于像美国和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

在讨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国内保障之前，先来看看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有没有可能性在长期保持比发达国家快得多的平均增长速度。从世界经济历史来观察，现在的欧美发达国家在它们早期的发展中，很少能够达到 5% 以上的年均增长

^① 参见温特图尔国际研讨会演讲集《世界经济走向何方？》，日内瓦，1996 年。

率；而日本在 1950—1974 年间的年均增长率高达 10%；韩国在 1962—1989 年间，我国台湾在 1950—1989 年间都达到了 9% 的增长率；我国大陆在 70 年代末到 90 年代中期增长率也接近 10%，而一些沿海省份更高达 12%。

这种经验表明，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如果具备了实现经济起飞的条件，完全有可能以超过早期发达国家的速度增长。这不仅是一种可能性，而且具有一定的规律性。这是因为，早期的发达国家从始至终都必须站在技术创新的前沿阵地上；而后起国家或地区则可以借鉴和引进发达国家的现成技术，因而发展成本相对低廉。所以，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为“后发优势”。

但是，一个赶超的国家或地区，能否利用起这种“后发优势”，归根结底在于其国内的政治、经济和环境的保障。从我国的特殊情况来说，能否实现下个世纪宏伟目标，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是：中国是否具备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国内保障。

要理直气壮地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三个方面着眼：第一，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能否保持改革开放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或者简而言之就是可持续的政策保障；第二，过去近二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能否继续应用于今后的发展。或者简而言之为可持续的改革方式；第三，中国的资源、环境能否支撑继续的高速增长。或者说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性。

为了回答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有必要概括和总结一下我国改革开放的政治保障和推进特征。中国的改革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最根本的不同，首先在于我们的改革是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改革。由于有了这种政治保障，使得我国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正如说中国过去近 20 年的发展来自于改革一样，前面所述的目标的实现，也要靠继续改革和正确的改革方向来保障。

这个保障也是有充分科学依据的。因为，我们过去的改革过程，并非得益于我们每一项改革措施都是正确的，而是得益于我们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我们改革的逻辑注定了这个方向是不可

逆转的。

我们知道，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选择的激进式改革——“休克疗法”不同，我国经济改革的基本特征是渐进式的。迄今为止，这种改革方式的效果得到了改革实践的肯定，也在世界范围获得了高度评价。《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把捷克总统的一句话与邓小平的一句话作了比较，肯定了中国改革道路的成功。前一句话是“一个人不可能分两步跨过同一条壕沟”，这是激进式改革如休克疗法的理论基础。邓小平的话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是我国改革策略的高度概括。^①

我国经济在下个世纪能否持续高速增长的另一个保障，涉及到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性。在任何生产过程中，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都是最基本的投入要素。在经济学家最为关注的这三种基本生产要素中，每一种要素都与人口、资源和环境过程发生直接关系。首先，环境的优劣会直接影响到每一种生产要素的质量从而影响生产率的高低。例如，环境恶化造成的疾病，就会降低劳动力的素质，使得劳动生产率下降。其次，以土地为主要形态的自然资源，本身就在这个过程之中，其优劣直接表现为生产率的高低。

在一定的条件下，我们可以说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如果让自然的支出达到某种程度，使得一方面自然本身来不及更新和再生，另一方面我们人类来不及靠科学技术的进步寻找到替代物，就会损害经济增长。环境问题也是一样。当对环境的损伤超过修复时，它会以多种方式制约我们的增长过程。

在我国的经济发展现实中，人口、资源和环境之间的不协调问题已经十分突出。一方面，我国资源总量相对匮乏，从人均的

^① 详细地讨论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不是本书的目的。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一书。